



—袁国平烈士

■编者按:在南京雨花台功德园的红星园里,长眠着唐亮、杜平、饶子健、刘飞、刘先胜、聂凤智等百余位开国将军和老红军。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堪称一部壮丽的史诗,其中的篇章,既有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也有和平年代的柔情大爱。《发现》周刊联合《铁军》杂志、雨花台功德园共同推出“红星园·将星闪耀”系列,一一为您介绍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袁国平(1906—1941):湖南省宝庆县(今邵东县)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率部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坚持斗争,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党代表。后进入中央苏区,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八军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1936年起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科政治委员,抗日红军大学第二校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共陇东特委书记等职。1938年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1年在皖南事变突围中壮烈牺牲。1955年6月19日安葬于南京雨花台的皖南事变三烈士墓。

99发子弹射向敌人 最后一发留给自己

袁国平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一个弹棉絮的工人家庭。他从小求知欲很强,凭着自己的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1922年9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一师”的革命氛围熏陶和毛泽东、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很快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而他在皖南新四军的时日,是他一生中工作最具创造性、成果最辉煌、生活最丰富多彩的一页。

□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肩负重任,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统一整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同年10月12日,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活动的华中地区,是敌伪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国民党极力争取的地区,斗争情况错综复杂。要在敌伪夹缝中奋斗和成长壮大,坚持抗战到底,离不开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因此,政治部主任的人选就显得极为重要。这时,毛泽东同志想到了袁国平。他长期担任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职务,有着出色的表现和丰富的经验。他所展现出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才华,给毛泽东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赞誉他为红军的宣传鼓动家,毛泽东同志在致项英电中还特别指出:“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

袁国平离开延安前,毛泽东同志专门约见他,亲切交谈,同他长谈了数个小时。1938年

3月29日,袁国平率领派往新四军的50名干部从延安出发,途经西安到达武汉。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见到周恩来同志。周副主席嘱咐他说,到新四军以后,要认真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特别是要重视运用抗日胜利的捷报来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族的抗日动员。

1938年4月26日上午,袁国平一行风尘仆仆抵达皖南岩寺新四军军部。这天,军部正在召开挺进敌后抗战誓师动员大会。袁国平径直来到会场,同广大干部见面,发表了即席讲话。传达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指示,对即将挺进敌后的部队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袁国平英姿飒爽的儒将风度,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过他演讲的红军老战士李岩回忆说:“各种发言、报告,听了好多,但是从来没有听到像袁主任这样的演说,口才这么好,声音这么洪亮,很有煽动性,听起来特别受鼓舞。”

呕心沥血,发展壮大新四军

袁国平到皖南后,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使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谆谆嘱咐,他和新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发展壮大新四军,开辟和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部队编组仅10天,就陆续向苏南、苏皖边、皖中和皖东敌后挺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创建抗日根据地过程中,部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由苏南派第四、第六团及游击武装一部沿江占领苏北沿江地带,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为向苏北发展打下了基础;由皖南渡江到皖中的有3个营(即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1营、第五团第3营),成为江北游击纵队和挺进团的骨干和基础,将第四支队扩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支队,后又建立了第六支队;成立教导队、教导总队,袁国平亲自兼任教导总队政委,传授红军的传统和八路军的经验,培养干部5000名以上,为新四军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39年2月,周恩来来新四军视察,与叶挺、项英、陈毅

和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一起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到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到1940年底发展壮大为88744人。

新四军是由红军和游击队编组而成的,在三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红军游击队通常分散成几十人甚至十几人的小分队各自为战。组建后仅整顿数日就深入敌后抗战,部队建设的各项工,很难正常进行。为开拓新四军政治工作新局面,袁国平领导了部队进军敌后的动员,两次主持召开新四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新要求;参与主持召开新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的报告》,对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作出部署;主持制定《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更加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参与新四军军分会和东南局的集体领导,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和对敌斗争,作出了积极努力。



军歌嘹亮,主持创作新四军军歌

袁国平还受项英的委托,主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他按照项英提出的“新四军军歌应是全军昭示天下的宣言书,是全军的行动纲领,军歌要能使全军都明确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要求,在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搞好曲谱。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在听完

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进军的气魄。第二稿谱好后,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大家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就是袁国平主任。”

皖南事变前夕,袁国平还亲自创作了《别了,三年的皖南》歌词:“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并由任光谱曲。这首悲壮的战歌,见证了江南新四军离开皖南、北渡长江、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斗历程。

血流皖南,最后一发子弹留给自己

1941年1月14日晚,袁国平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发现时,浑身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做了个担架,抬着他走。天亮前赶到青弋江岸。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抬他的战士一个个倒下,袁国平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赴后继地把他抬起,边抬边打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对岸章家渡。此时,100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三四十人了。袁国平由于在渡河时再度受伤,身体极度虚弱。战士们喊了半天他才醒。他挣扎着把笔记本和7块大洋

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当战士们泣不成声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袁国平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践行了他在皖南部队突围动员时所讲的“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誓言。

皖南事变后不久,袁国平的哥哥袁醉如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询问袁国平的下落。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向八路军总部请示后,受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委托,告诉袁醉如说:“袁国平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英勇自尽,壮烈牺牲。”后来,李甫发表了《回忆皖南事变中袁国平同志牺牲的经过》的文章。

人民没有忘记

新中国成立不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指示领导机关,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派人赴皖南寻找袁国平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项英、周子昆的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重新安葬在南京雨花台旁的望江矶,定名为皖南事变三烈士墓。1956年11月2日邱一涵病逝后,南京军区暨江苏省委根据她的遗愿将她与丈夫袁国平合葬。2001年,在袁国平牺牲60周年之际,当年的战友们为他树立了铜像。2006年5月26日在袁国平100周年诞辰纪念时,经中央领导批准,出版了《袁国平文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纪念袁国平百年诞辰座谈会也分别在江苏南京和袁国平家乡湖南邵东县举行。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还在《解放军报》发表《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表达了对袁国平的深深怀念;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在《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应公正的评价袁国平同志的革命业绩》。2010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又以解放军总政部的名义同时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称“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